

从哲学、史学、文献学角度 全面整理、研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王启涛

[提要]在新的时代,我们如何全方位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认为可以从哲学、史学、文献学三个角度入手。亦即:从哲学的角度,讲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从史学的角度,讲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从文献学角度,讲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字词本义。本文以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为例,加以论证。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史学;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12—00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17AYY015)、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0—GMB—004)、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研究”(SC20ZDZ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启涛,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川成都610041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承,数千年来绵延不绝。其间成功与失败并举,经验与教训并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总结道“经稟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1](P.49)]可见,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以儒家元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与传承,要么死守早期注释家之

成见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么忽视前辈研究者之严谨立论而另立新说,要么党同伐异而不见百家争鸣,要么杂乱无章而不得要领,要么繁琐考证而流于琐碎,要么空疏阐发而缺乏根柢。

在新的时代,究竟应该怎样整理、研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应该从哲学、历史学和文献学三个角度入手。近年来,甘霖先生焚膏继晷,精耕细作,先后推出两部力作《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2]《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3],在这一方面做了宝贵的尝试,今以《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以下简称《〈论语〉新解》)为例,试论证之。

一、从哲学的角度,讲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

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要讲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历史的同情。钱穆指出“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4](P.1)]《〈论语〉新解》开宗明义:“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他说这话时,距离孔子去世至少在三个半世纪以上,今天的我们,比起司马迁,距离孔子的时代要远很多很多。但不变的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想见其本来的面貌:本来的时代,本来的思想,本来的人。”^{[2][P.1]}《〈论语〉新解》所言“本来的时代”就是历史学“本来的思想”,就是哲学;“本来的人”就是文献学。

关于《论语》的哲学思想,《〈论语〉新解》这样阐释道“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如曾子所言‘仁以为己任’(《泰伯篇》);以‘道’为归依,如自己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姑名之曰‘仁道主义’。要而言之,该主义由以下之自在的宇宙观、自为的人生观、推己的伦理观、无为的政治观和渐进的历史观构成。”^{[2][P.16]}

首先,是自在的宇宙观。在孔子看来,“天何言哉”(《阳货》),上天是主宰,但天与人分隔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因此我们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正因为如此,“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论语〉新解》对最后一句话注释道“子不语:先生不(与人)讨论。语,谈论、讨论。《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皇侃‘发端曰言,答述曰语,此云不语,谓不诵答耳。非云不言也。’历代注家纠结于孔子不说怪力乱神与事实(记载)不合(《论语》中的‘怪’,只出现这一次‘力’,13次;乱,14次;神,6次)实则孔子有‘言’而无‘语’。又朱熹引谢氏‘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2][P.139]}《〈论语〉新解》将最后一篇文章这样今译道“先生不与人讨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的话题。”^{[2][P.139]}在孔子看来,天人之间的连接靠的是祖先,因此,孔子格外重视孝道,以及相关的丧礼和祭礼,所重:民、食、丧、祭(《尧曰篇》),他祭拜祖先是非常虔诚的,与对天帝的态度迥然不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这里的‘神’指的是祖先神^{[2][P.18]}。

其次,是自为的人生观。在孔子看来,人生是自为的,个体是自我的,不但具有自主性,而且具有自利性。为学的真谛是充实自身,仁的真谛是从每一个人做起,包括从政,也要从自身严格要求做起,“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①;“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③。在孔子看来,君子的理想固然是扬名立万,“子曰: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④,但只要自己做得够好,就不怕别人不知道,“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⑤,因此,君子最终应该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⑥。正如《〈论语〉新解》所言“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那么,中国哲学从这个大大的‘己’字出发,构建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体系,是完全合乎人类文明进步的逻辑的。至于到了宋明理学,强化天理人欲的观念,背离人类文明大道,这是中华文明发展曲折性的反映。”^{[2][P.23]}

再次,是推己的伦理观。在孔子看来,就是克己复礼,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⑧,使天下归仁。《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⑨

最后,是无为的政治观。在中国古代,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名家、法家,都倡导无为而治^⑩。在孔子看来,要无为行政,首先要正名,也就是要严守名分边界,要使上下尊卑有序、人伦等级分明,彻底做到名副其实,实至名归。《论语·子路》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⑪《〈论语〉新解》注释道“必也正名乎:那一定是将不正当的名义纠正过来!正,纠正,矫正。名,名称、名义、名分。从语言方面说,正名指名称和含义相一致。这样,就不会同名而异义,或同义而异名,导致说话矛盾、交流困难,即下文‘言不顺’。皇侃引郑玄‘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从现实方面说,正名指名义和行为相吻合,这样,就不会名实不副,或名实相悖,造成举措失宜、行为不当,即下文‘事不成’。何晏引马融‘正百事之名也。’”^{[2][P.253-254]}可见,“正名”是礼乐和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检《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⑫《〈论语〉新解》今译道“齐景公向孔先生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君有君样,臣有臣样,父有父样,子有子样。’”^{[2][P.244]}

由此看来,“正名”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且人类实际生活在语言世界,恰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唯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唯有这样物才存在(ist),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唯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5]由于古今中外的行政首先是语言文字行政,因此,“正名”首先是一项语言文字工程,也就是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背景下推行以“雅言”为代表的通用语言文字以及实施“书同文”“语同音”的语言文字规范化运动,《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6]何晏注“孔曰‘雅言,正言也。’郑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执。’”邢昺疏“此章记孔子正言其音,无所讳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诗》《书》《礼》也。此三者,先王典法,临文教学,读之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背文诵,但记其揖让周旋,执而行之,故言执也。举此三者,则六艺可知。”^[7]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二《执礼》:“《论语》:雅言,诗书执礼。郑康成言礼不诵,故言执,乃分诗书为言,执礼为执持礼书,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盖诗书博引,礼则必以其人其所当执者言之。与父言慈,与子言孝,见鲁哀齐景言侯礼,见孟孙季孙晏婴言卿礼,见孺悲等言士礼,此雅言之执礼也。”^[8]孔子坚持以雅言(通用语言文字)上课,讲授《诗》等课程^[9],在孔子的心目中,《诗》与“礼”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用雅言对《诗》的阅读,本身就是“礼”的一部分,而在行政、外交等重要场合能够诵《诗》,就是懂“礼”的体现,《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0]可见,以《诗》为代表的经典与政治、外交、教育是紧密结合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论语》:“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2]《论语》:“陈亢问于伯鱼曰‘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又检《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新解》注释“兴于《诗》:以《诗》激发兴趣。

兴,兴起,含开始之义,何晏引包咸‘言修身当先学《诗》也。’兴、立、成,固然有次序意味,也当就功能而言。皇侃引江熙‘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朱熹引程子‘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立于礼:以礼立足社会。立:立身,从次序来说,指有所成就。参《为政篇》第四章注释。朱熹引程子‘古人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成于乐:以乐健全人格。成,完成。何晏引孔安国‘乐所以成性也。’朱熹引程子‘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2]又检《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新解》注释“错乱的乐章才得到纠正。《雅》乐和《颂》乐重归各自固有的门类。乐正,指乐曲得到整理,杂乱的状况得以纠正。《雅》《颂》,《诗经》的两类,这里指《雅》乐和《颂》乐。程树德‘正乐之说不一。或曰正乐章,毛西河主之。(详见《四书改错》,以文繁不录)或曰正乐音,包慎言主之。玩‘各’字之义,则《雅》自《雅》、《颂》自《颂》。玩‘乐’字之义,实指《雅》《颂》之奏于乐章而言。”^[2]

总之,“正名”之“正”,是指从语言文字规范化入手,尤其是推广通用语言文字,将其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重要的礼乐工程或礼法工程,延及行政、教育、法律、艺术^[13]、祭祀、军事、交通、商贸、度量衡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规范化,从而共同构成“礼”的范畴。

以“正名”为中心的“礼”,是大一统王朝最鲜明的体现,是“王道”的体现,是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基本国策,唯有圣王才能够做好此事。《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4]《荀子·正名》:“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15]《荀子·正名》:“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16]《荀子·正名》:“然则所名为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17]《荀子·正名》:“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荀子·正名》:“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

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²¹《荀子·正名》:“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恚;恚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²²在先秦时代,就有著名的“书同文”,指中央王朝对语言文字的规范与统一,它体现的是中央王朝伦理、礼乐与教化在圣王治理下的统一与秩序,体现了各民族的交流与交融,团结与进步,考《礼记·中庸》:“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礼,谓人所服行也。度,国家宫室及车舆也。文,书名也。今,孔子谓其时。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孔颖达正义“非天子不议礼”者,此论礼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论议礼之是非。“不制度”,谓不敢制造法度,及国家宫室大小高下及车舆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书籍之名也。“今天下车同轨”者,今谓孔子时车同轨,覆上“不制度”,“书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伦”,伦,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议礼”。当孔子时,礼坏乐崩,家殊国异,而云此者,欲明己虽有德,身无其位,不敢造作礼乐,故极行而虚己,先说以自谦也。”朱熹集注“此以下,子思之言。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度,品制,文,书名。‘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²³

一旦“正名”缺失,名实相乱,名不副实,必然带来礼崩乐坏,接下来的是王朝的崩塌和大一统局面的丧失,后果不堪设想。恰如《荀子·正名》所言“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²⁴《荀子·正名》:“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执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

二、从史学的角度,讲透中华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还是一个注重记载历史、整理历史、研究历史和传承历史的国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厚重的历史沃土,必然有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必然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当时孔子五十岁,中国的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而政治社会变迁,归根结底源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不是小变,而是大变,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解放的时代。

礼崩乐坏,实质是共主政治的坍塌、贵族政治的动摇,由此而引起经济制度、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变化^{[2][P.3]}。孔子希望在东方的鲁国复兴西周曾有的礼乐秩序,依据他“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逻辑,先变齐国,再以鲁国和齐国为基础推开去,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文明。这实质上是要恢复一种社会安定有序的局面,并非一成不变的复辟。比如他对齐桓公大加称赞,《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²⁵又检《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谄。’”孔子对齐桓公的称赞,是以安定天下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囿于原有的等级划分。

孔子的历史观,是一种“渐进”的观念,他强调对古代文化的延续和继承,“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延续了殷商时代的文献整理之风,“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²⁶

早在商王朝,文献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尚书·多士》:“王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²⁷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有很浓郁的商文化因子。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²⁸。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引《家语》称“孔子,宋微子之后。”孔子的六代祖孔父嘉,为宋穆公时的大司马,宋殇公继位时的顾命大臣,后为另一贵族大臣所杀,其子出奔鲁国。《左传》昭公七年杜注)孔氏,便来自于孔父嘉的字(孔父)。自此之后,孔氏由大贵族(卿)降至贵族的最底层(士)。孔子早孤,祖上留下唯一受用的财富就是殷人重礼的习惯^{[2][P.5]}。“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卫灵公问陈于

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②。知礼^③,成为孔子谋生的重要手段,诸如助祭之类的相礼活动是他的职业之一。他“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

孔子“渐进”的历史观,体现在孔子认为夏商周在文化上的一脉相传。《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即继承,我们不禁要问:周从商、商从夏究竟继承了什么?答案是:继承了“三纲五常”这样的中华民族核心要义。三国魏何晏集解有云“马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宋邢昺疏“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礼,谓三纲五常不可变革,故因之也。所损益者,谓文质三统。(中略)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礼。及所损益,事事亦可知也。(中略)云‘三纲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纲者何谓?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有纪纲之而百目张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人为三纲,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转相生也。夫妇,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云‘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白虎通》云:‘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爱人。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于事,见微知著。信者诚也,专一不移。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云‘损益谓文质三统’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道极则阴道受,阴道极则阳道受,明一阳二阴不能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尚书大传》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礼三正记》曰‘质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质性,乃后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谓三统,故《书传略说》云‘天有三统,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可见,像三纲五常这样的中华民族核心要义,在夏商周是一脉相传的。

夏商周不可分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具有商文化因子,还可以从语言文字学上得到证明。商的甲骨文,被周继承,商的语言也被周继承。夏商的重镇是黄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区,周平王迁都以后,雅言就是以洛阳话作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向熹指出“周起源于中国西北部,跟商属于不同的部族,但早有接触。公元前1046年甲子,周武王灭商,接受了商的文化传统,周公旦东征胜利,大力开发东部地区,建立东都洛阳,封康叔于卫以统治商的故都,封伯禽于鲁,统治黄河下游,把商的大部分‘顽民’迁于成周,一部分迁于卫,一部分迁于鲁,商周两族人民杂居,语言开始融合。周平王东迁洛夷以后,商周两族的关系尤为密切。商族人口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准较高,而且在黄河流域有着牢固的统治基础,结果周族语言和商族语言相融合,周人还接受了商人创造的文字,现在我们看到,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的周代甲骨文、周代金文和商代甲骨文在结构上极其相近,词汇上也相差无几。”^{[7](P.24-25)}

商文化是孔子的故国文化,孔子对之无限崇敬和怀念,《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对周武王并不完全认同^④,因为周武王用暴力夺取了殷商的政权^⑤,《论语》不止一处体现了孔子对商文化的整理、研究与传承心愿,《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⑥这里的“文献”,“文”指文字资料,“献”指熟悉礼仪制度的所谓贤人。孔子到夏、殷的故地搜集文献,访求遗贤,作为整理、传授夏礼、殷礼的来源和根据,他学习、研究夏商周三代文化,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礼乐制度。这固然是为实现政治抱负服务,也是他的文化兴趣。这种文化兴趣不断增强,与政治遭遇的每况愈下形成鲜明对照,整理文献、传之后世便成为他的人生的最后归宿^{[2](P.4)}。孔子到夏商故地杞宋寻访文献,了解夏礼、殷礼的遗存。本来,“周礼尽在鲁”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似乎不需要再去寻访夏礼、殷礼了,孔子做出这样不寻常的举动,可能他本来就认为周礼并不完善,而且已经不适合现实的需要了,殷礼曾经是中原文明的大宗,现在应该在周礼的外壳下充实夏礼特别是殷礼的内容。孔子收徒讲学,整理古代文献(即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都是“好学”的内容。“好学”未能如孔子之所愿,成就他治国安邦的事业,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

了大量学生的人”^{[2] P.13)}。

孔子对殷商的怀念,还体现在对殷商时期涌现的坚贞不渝的志士仁人极为崇拜,《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⑤《论语·季氏》:“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至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⑥《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⑦孔子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由衷赞扬,认为他们是“古之贤人”(《论语·述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不念旧恶,怨用是希”(《论语·公冶长》)^⑧孔子对本族先贤钦心的同时,也透出一种隐隐的痛感^{[2] P.8)}。恰如《〈论语〉新解》所言“孔子对祖先的文化‘心有戚戚’,虽然对作为统治部族的周文化的尊崇态度溢于言表,——‘吾从周’(《八佾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篇》),对殷商文化实给予了更高的赞赏。如称赞微子、箕子、比干‘殷有三仁焉。’(《微子篇》)《论语》全书所载孔子认可为‘仁’的,仅此一例。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只是认可‘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篇》)而已。傅斯年说:称殷三仁,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周东封与殷遗民》)。孔子之‘从周’,是由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篇》),傅斯年认为这些都表明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2] P.8-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分析孔子不得志的根本原因,其实是那时候诸侯国终究不是姬姓(鲁、卫)便是姜姓(齐),怎么可能让一个殷人的后裔治理国家?所以,即便是在他的家族已经生活了几代的鲁国,他还是干不长,长期在外过着漂泊的生活,最后的结果是,孔子“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记载孔子辞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予始殷人也!’——我本殷人!”^{[2] P.9-10)}

孔子对商文化中坚贞不渝的志士仁人的崇敬^⑨还可以从一个细节看出来,那就是对“柏”这种树木的尊崇。《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⑩原来,“柏”是商朝非常崇拜的树种,象征坚贞长久。《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⑪

三、从文献学角度,讲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字词本义

文献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国也是世界上文献最为丰富的文明古国,而孔子是杰出的文献学家。《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邢昺疏“此章言君子若博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俭约,则不违道也。”《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博我以文”,是孔门培养君子的一项主要内容,即广泛地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等“约之以礼”是另一项主要内容,即用礼乐制度规范实践行为,其中包括“游于艺”的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等^{[2] P.33)}“文”“礼”两者互相包容交融,并不矛盾。孔子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里讲正乐,也涉及正《诗》^⑫。孔子的弟子中,有“文学”一家,其实就是文献学。《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主要指《诗》《书》《易》及礼乐等历史文献^{[2] P.215)}。

孔子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但他自以为负有神圣的使命,“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这个使命就是延续文化的使命,说得更具体点,就是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传承使命。孔子的这个觉悟,有人也感知了,仪封人在见了孔子之后对孔子的学生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木铎”,喻号召、引导,“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说上天将让夫子做天下人的导师,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清明(有道)的世界^{[2] P.11)}。

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文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量文献来自遥远的古代,因此,文献整理至关重要。文献整理涉及文献的校注和今译。文献校注必须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必须将文字、音韵、训诂与版本、目录、校勘相结合,《〈论语〉新解》对汉初《论语》抄本——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给予极大的关注,因为这是《论语》的最早抄本。1973年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8]。“以这个残本与今本对照,分章略有不同,字句差异较大,主要是简本的语气助词多,通假字多,但无妨意义一致。可见《论语》的篇章结构和字句内容,在汉初就基本上稳定下来。《张侯论》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善形成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的重要性,在

于它是今传《论语》的祖本。”^{[2] [P.38]} 《〈论语〉新解》对地面已经失传而重现于敦煌吐鲁番的东汉郑玄《论语注》高度重视,“东汉人郑玄(127-200)撰《论语注》。原书已佚。郑玄为经学大家,曾遍注群经,成一家之言。他在《张侯论》的基础上,以《古论语》校之并作注。读《论语》,当首重郑注。今所见郑注重要者,一为何晏集解本所引,一为辑佚本所集,一为唐写本所存。”^{[2] [P.38]} 正是因为《〈论语〉新解》广泛吸收了出土文献的珍稀语料,从而使其校注和今译持论公允,如老吏断狱。

文献的今译要做到“信”“达”“雅”。“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这一方面,《〈论语〉新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集解》今译“先生说‘那种一向好言好语、和颜悦色,现在又点头哈腰的态度,左丘明以为可耻,我孔丘也以为可耻。’”^{[2] [P.100]} 这一今译不仅有传世文献的佐证,更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吐鲁番出土文献 64TAM19:34,58,59 唐写本郑氏注《论语·公冶长篇》(3-275)^⑤：“‘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郑玄注:‘足恭,谓跨跂进退多姿态。’”“跨跂”实即“夸毗”。考《尔雅·释训》:“夸毗,体柔也。”郭璞注:“屈己卑身以柔顺人也。”宋邢昺疏“《大雅·板》篇云‘无为夸毗。’故此释之也。毛传云‘夸毗以柔人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于人曰体柔。’然则‘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为恭,以形体顺从于人。故郭云‘屈己卑身以柔顺人也。’”又检《诗·大雅·板》:“天之方憯,无为夸毗。”毛传“夸毗,体柔人也。”朱熹集传“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则以谀言毗之也。”《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李贤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又考《龙龕·身部》:“𠂔,今,苦瓜反,𠂔,体柔人也。”紧接着又言“𠂔,音毗,𠂔。”^⑥均其证。

又如《论语·学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⑦《〈论语〉新解》今译“恪守忠信原则,不要跟(这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交友。搞错了就不要害怕改正。”^{[2] [P.10]} 《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⑧《〈论语〉新解》今译:“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不学习,就会昏头胀脑。”《论语·里仁》:“事君数,斯辱

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新解》今译“数,音朔,频密,屡屡。指对君上的过错屡屡规劝。”译:“对国君反复规劝,不厌其烦,就会自取其辱,对朋友反复规劝,苦口婆心,反而会被疏远。”^{[2] [P.78]} 又如《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⑨《〈论语〉新解》今译“先生说:君子与人亲近,团结而非勾结,小人与人亲近,勾结而非团结。”^{[2] [P.30]}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⑩《〈论语〉新解》今译“先生说:‘君子和谐而不同,小人同一而不和谐。’”^{[2] [P.267]}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⑪《〈论语〉新解》今译“先生说‘君子大方而不自大,小人自大而不大方。’”^{[2] [P.269]} 《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⑫《〈论语〉新解》今译“孔先生说:有益的朋友三种,有害的朋友三种,同直话直说的人交朋友,同忠信不欺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了。同只说好话的人交朋友,同一味和顺的人交朋友,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便有害了。”^{[2] [P.330]} 又检《论语·泰伯》载曾子之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笱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新解》注释“道,与下文‘笱豆之事’的‘事’相对,又前言鸟将死,人将死,则此道当指祭祀之道,即对待祭祀的态度。何晏引郑玄‘此道,谓礼也。’注家多以待人接物之礼,失之宽泛。”“‘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举手投足,就当消除粗暴和怠慢。”“‘正颜色,斯近信矣’:端正表情,就当体现真情和实意。”“‘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表达话语,就当克服偏狭和乖戾。”^{[2] [P.155]} 这些注释,言简意赅,堪称的论。

文献整理还体现在不墨守古训,也就是对于古训择善而从。《论语·乡党》:“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这是儒学史上最为普遍的断句^⑬。但是,《〈论语〉新解》借鉴了清代学者俞樾的建议,对此处断句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俞樾此当以‘便便’为句,《诗·采芣》篇‘平平左右。’《释文》引《韩诗》作‘便便’,闲雅之貌。是便便以貌言,正与上文‘恂恂如也’,王注曰‘恂恂,温恭之貌’其义一律,但省‘如也’两字耳。‘言唯谨尔’四字为句,凡有所言无不谨慎,故曰‘言唯谨尔’,此与上文‘似不能言者’相对,盖此两节皆上一句说孔子之容,下一句说孔子之言,郑注失之。”(《论语平议》)按:历代注家多以‘便便言’为句,从郑玄注‘便便,辩也’,似与孔子平素主张‘敏于事而

纳于言’不合,今从俞说。”^[2] [P. 191-192] 于是将原文断句为“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笔者赞成这个断句^④。

结语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P. 266-268] 我们生逢盛世,加之地不爱宝,新旧材料汗牛充栋,应接不暇。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承,拥有千百年来前代学者并不具备的主客观条件,这是人生之幸,也是时代之幸,更是国家民族之幸。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哲学的角度,归纳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学角度,探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来龙去脉与心路历程;如果我们不能从文献学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进行科学地甄别、辨伪、缀合、断代、校注、今译,以求典籍之原貌、字词之本义,我们就依然不能够在前贤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超越,我们就无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新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守正创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哲学、史学、文献学三个维度,全方位、多角度整理、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项伟大工程任重而道远,劳苦而功高。

注释:

①邢昺疏“此章言为政者当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观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虽教令滋章,民亦不从也。”

②邢昺疏“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诚也。诚能自正其身,则于从政乎何有?言不难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则虽令不从,‘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③邢昺疏“此章言为政在乎修己。‘对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于齐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为鲁上卿,诸臣之帅也,若己能每事以正,则己下之臣民谁敢不正也。”

④邢昺疏“言君子病其终世而善名不称也。”

⑤邢昺疏“此章戒人己也。病,犹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无圣人之道,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⑥邢昺疏“此章言君子责于己,小人责于人也。”

⑦《论语·颜渊》:“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⑧见《论语·雍也》。

⑨邢昺疏“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者,克,约也。己,身也。复,反也。言能约身反礼则为仁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复礼,则天下皆归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犹见归,况终身行仁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岂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颜渊曰:请问其目’者,渊意知其为仁必有条目,故请问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者,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

也。《曲礼》曰‘视瞻毋回’‘立视五属’‘式视马尾’之类,是礼也。非此则勿视。《曲礼》云‘毋侧听’,侧听则非礼也。言无非礼,则口无择言也。动无非礼,则身无择行也。四者皆所以为仁。‘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者,此颜渊预谢师言也,言回虽不敏达,请敬事此语,必行之也。此注‘克’训为‘约’。刘炫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嗜欲所逼,己离礼,而更归复之。今判定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谓能胜去嗜欲,反归于礼也。’”

⑩王先谦《荀子·正名》集解“是时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⑪何晏集解“孔曰‘礼以安上,乐以移风,二者不行,则有淫刑滥罚。’”邢昺疏“此孔子更陈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顺成,名由言举。名若不正,则言不顺序,言不顺序则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则君不安于上,风不移于下,是礼乐不兴行也。礼乐不行,则有淫刑滥罚,故不中也。刑罚枉滥,民则踰地局天,动罹刑网,故无所错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为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于其所言,无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云‘礼以安上,乐以移风’者,《孝经·广要道章》文,言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明男女长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风移俗易。先入乐声,变随人心,正由君德,正之与变,因乐而彰,故可以移风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则有淫刑滥罚’者,《礼运》云‘礼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又《乐记》曰‘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故礼乐二者不行,则刑淫滥而不中也。”

⑫邢昺疏“此章明治国之政也。‘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者,齐君景公问为国之政于夫子也。‘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国家正也。当此之时,陈桓为齐大夫以制齐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对之。”

⑬《《论语》新解》译为“先生诵《诗》读《书》,用的是西周官话,主持各种礼仪,说的是西周官话。”(第137页)

⑭刘宝楠《论语正义》:“周室西都,当以西都音为正。平王东迁,下同列国,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称《风》。而西都之雅音,固未几废也。夫子凡读《易》及《诗》《书》,执礼,皆用雅言,然后辞义明达,故郑以为义全也。后世人作诗用官韵,又居官临民,必说官话,即雅言矣。”

⑮《《论语》新解》指出“‘执礼,皆雅言也’,赞礼的时候,也都是用的官话。执礼,即掌礼、赞礼。翟灏‘古者学礼行礼,皆有诏赞者为之宣唱校呼,使无失错,若今之赞礼官。其书若今之仪注。于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本章断句,俞樾独出心裁:‘《论语》文法简质,此章既云子所雅言,又云皆雅言也,于文似复,盖由京师失其读矣,此当以《诗》《书》断句,言孔子诵《诗》、读《书》,无不正其音也。执礼一字自为句,属下读,执礼,谓执事也。《周官·太史》曰:凡射事,执其礼事。《礼记·杂记》曰:女虽未许嫁,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皆执礼之证也。孔子执礼之时,苟有所言,如《乡党》所记宾不顾矣之类,皆正言其音,不杂以方言俗语,故曰执礼皆雅言也。《诗》《书》或诵或读或教授弟子,若执礼,自为一事,故别言之耳。’(《论语平议》)今从俞说。”(《《论语》新解》第137页)

⑯邢昺疏“此章言人之才学贵于适用。若多学而不能,则如不学也。诵谓讽诵。《周礼注》云‘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诗》有《国风》《雅》《颂》,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诸侯之政也。古者使适四方,有会同之事,皆赋《诗》以见意。今有人能讽诵《诗》”

文三百篇之多 若授之以政 使居位治民 而不能通达 使于四方 不能应对 讽诵虽多 亦何以为。言无所益也。”

⑬何晏集解“孔曰‘兴 引譬连类。’郑曰‘观风俗之盛衰。’孔曰‘群居相切磋。’孔曰‘怨刺上政。’”

⑭何晏集解“马曰‘《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三纲之首 王教之端 故人而不为 如向墙而立。’邢昺疏“此章劝人学《诗》也。‘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者 小子 门人也。莫 不也。孔子呼门人曰：何不学夫《诗》也。‘《诗》可以兴’者 又为说其学《诗》有益之理也。若能学《诗》 《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可以观’者 《诗》有诸国之风俗 盛衰可以观览知之也。‘可以群’者 《诗》有‘如切如磋’ 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 《诗》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 故可以怨刺上政。‘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者 迩 近也。《诗》有《凯风》《白华》 相戒以养 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颂》君臣之法 是有远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与君 皆有其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 言诗人多记鸟兽草木之名以为比兴 则因又多识于此鸟兽草木之名也。‘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者 为 犹学也。孔子谓其子伯鱼曰：女学《周南》《召南》之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者 又为说宜学《周南》《召南》之意也。墙面 面向墙也。《周南》《召南》 《国风》之始 三纲之首 王教之端 故人若学之 则可以观兴；人而不为 则如面向墙而立 无所观见也。云‘《周南》《召南》 《国风》之始’者 《诗序》云‘然则《关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风 故系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 诸侯之风也 先王之所以教 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谓之正国风 为十五国风之始也。云‘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者 亦《诗·关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 先美家内之化 是以《关雎》之篇 说后妃心之所乐 乐得此贤善之女 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纲之首 王化之端’者 《白虎通》云‘三纲者何谓？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二南》之诗 首论夫妇。文王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 终以《麟趾》《驺虞》 言后妃夫人有斯德 兴助其君子 皆可以成功 至于致嘉瑞 故为三纲之首 王教之端也。”

⑮请比较《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集解“孔曰‘朱 正色。紫 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包曰‘郑声 淫声之哀者。恶其乱雅乐。’孔曰‘利口之人 多言少实 苟能悦媚时君 倾覆国家。’”

⑯邢昺疏“‘孔子曰：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者 王者功成制礼 治定作乐 立司马之官 掌九伐之法 诸侯不得制作礼乐 赐弓矢然后专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时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者 谓天子微弱 诸侯上僭 自作礼乐 专行征伐也。”其中当然包括“雅言”“正名”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⑰杨倞注“名之善者循之 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王先谦案“旧名 上所云成名也。新名 上所云‘托奇辞以乱正名’也。既循旧名 必变新名 以反其旧。作者 变也。《礼记·哀公问》郑注‘作 犹变也。’杨注未晰。”（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 414 页）

⑱杨倞注“道 谓制名之道。志通 言可晓也。《礼记》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异端改作也。’”

⑲杨倞注“无名则物杂乱 故智者为之分界制名 所以指明实事也。”

⑳杨倞注“《新序》曰‘子产决邓析教民之难 约大狃袍衣 小狃襦袴。民之献袍衣 襦袴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 以是为非。郑国大乱 民口哗哗。子产患之 于是讨邓析而僇之 民乃服 是非乃定。’是其类也。”

㉑杨倞注“迹 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乱其名 畏服于上 故迹长也。”又检《荀子·正名》：“辞让之节得矣 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 妖辞不出。以仁心说 以学心听 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 不治观者之耳目 不賂贵者之权执 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 吐而不夺 利而不流 贵公正而贱鄙争 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夜漫兮 永思寡兮 大古之不慢兮 礼义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君子之言 涉然而精 俛然而类 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 当其辞 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 志义之使也 足以相通 则舍之矣。苟之 奸也。故名足以指实 辞足以见极 则舍之矣。外是者 谓之诋 是君子之所弃 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故愚者之言 茆然而粗 嘖然而不类 譖譖然而沸 彼诱其名 眩其辞 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籍而无极 甚劳而无功 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 虑之易知也 行之易安也 持之易立也 成则必得其所好 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 《诗》曰：‘为鬼为蜮 则不可得。有覩面目 视人罔极。作此好歌 以极反侧。’此之谓也。凡语治而待去欲者 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 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 异类也 生死也 非治乱也。欲之多寡 异类也 情之数也 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 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 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 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 制于所受乎心之多 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 生甚矣 人之恶 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 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 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 则欲虽多 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 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 则欲虽寡 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 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 而求之其所亡 虽曰我得之 失之矣。”

㉒“同轨”也成为大一统的代名词 杜甫《冬末以事之东都 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颙宅宿宴饮散因得醉歌》：“疾风吹尘暗河县 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东一开眼 驻马偶识云卿面。向非刘颙为地主 懒回鞭辔成高宴。刘侯爱我携客来 置酒张灯促华馔。且将款曲终今夕 休语艰难尚酣战。照室红炉簇暖花 萦窗素月垂秋练。天开地裂长安陌 寒尽春生洛阳殿。岂知驱车复同轨 可惜刻漏随更箭。人生会合不可常 庭树鸡鸣泪如霰。”（引文据《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 第 500—501 页）

㉓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414 页：杨倞注“奇辞乱实 故法吏迷其所守 偏儒疑其所习。”

㉔何晏集解“马曰‘匡 正也。天子微弱 桓公帅诸侯以尊周室 一正天下。’受其赐者 为不被发左衽之惠。马曰‘微 无也。无管仲 则君不君 臣不臣 皆为夷狄。’”

㉕何晏集解“包曰‘老彭 殷贤大夫 好述古事。我若老彭 但述之耳。’”邢昺疏“此章记仲尼著述之谦也。作者之谓圣 述者之谓明。老彭 殷贤大夫也。老彭于时 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 笃信而好古事。孔子言 今我亦尔 故云比老彭。犹不敢显言 故云窃。云‘老彭 殷贤大夫’者 老彭即《庄子》所谓彭祖也。李云‘名铿 尧臣 封于彭城。历虞 夏至商 年七百岁 故以久寿见闻。’《世本》云‘姓{饒}名铿 在商为守藏史 在周为柱下史 年八百岁。{饒}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尧臣 仕殷世。其人甫寿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 彭是彭祖。老子者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 名耳 字伯阳 谥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 但述之耳’者 言老彭不自制作 好述古事。仲尼言 我亦若老彭 但述之耳。”刘宝楠正义“老彭 殷大夫 夫子亦殷人 故加‘我’以亲之。”

㉖孔颖达疏“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书 有典籍 说殷改夏王命之意 汝当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 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诸臣蹈道者 大在殷王之庭 有服行职事 在于百官。’言其见任用 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听用有德之者 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于彼天邑商都 欲取贤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 怜愍汝 故徒教汝。此徒非我有罪 是惟天命当然。”

①由于是被征服的部族,由于周人对商人的防范,商人直至春秋时期都被当作蠢人看待,这最典型的就是宋人,资章甫而适越(《庄子》)、握苗助长(《孟子》)、守株待兔(《韩非子》)、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子鱼论战》)。

②邢昺疏“俎豆 礼器。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孔子之意,治国以礼义为本,军旅为末,本未立,则不可教以末事。今灵公但问军陈,故对曰‘俎豆行礼之事,则尝闻之。军旅用兵之事,未之学也。’《左传》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其意亦与此同。军旅甲兵亦治国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礼,欲国内用兵;此以灵公空问军陈,故并不答,非轻甲兵也。”

③《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怨,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④《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⑤孔子自认为是继承周文王的,《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⑥邢昺疏“此章言夏、商之后不能行先王之礼也。‘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国,言夏、殷之后也。孔子言‘夏、殷之礼,吾能说之,但以杞、宋之君暗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献,贤也。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云‘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后’者,《乐记》云‘武王克殷,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是也。”

⑦邢昺疏“此章论殷有三仁,志同行异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者,微子,纣之庶兄。箕子,比干,纣之诸父。见纣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为奴,比干以谏见杀。‘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爱人谓之仁。三人所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忧乱宁民也。”

⑧邢昺疏“夷、齐,孤竹君之二子,让位适周。遇武王伐纣,谏之,不入。及武王既诛纣,义不食周粟,故于河东郡蒲坂县首阳山下采薇而食,终饿死。虽然穷饿,民到于今称之,以为古之贤人。此其所谓以德为称者与?”

⑨何晏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贤者。’郑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孔曰‘但能言应伦理,行应思虑,如此而已。’包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马曰:‘清,纯洁也。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合于权也。’马曰‘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

⑩又请比较《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邢昺疏“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无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称直道而行也。”

⑪孔子尤其崇尚志节的坚贞,《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邢昺疏“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帅,谓将也。匹夫,谓庶人也。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贱,但夫妇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⑫邢昺疏“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知松柏小彫伤;若平岁,则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朱熹集注引谢氏“土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欲学者必周于德。”

⑬邢昺疏“凡建邦立国,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丰镐,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谓用其木以为社主。”

⑭邢昺疏“此章记孔子言正废乐之事也。孔子以定公十四年来去鲁,应聘诸国。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

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也。”

⑮“3-275”表明此件文献图版见于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三册,第275页。

⑯这一方面的同源词很多,参考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87-89页。

⑰皇侃义疏“或通云:择友必以忠信者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论余才也。”邢昺疏“无友不如己者,言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也。”“过”指交友之过,皇侃义疏“一云‘若结交过误,不得善人,则改易之,莫难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为贵。’”

⑱何晏集解“不学而思,终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⑲何晏集解“孔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以君子小人相对,故观文为说也。”

⑳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邢昺疏“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㉑何晏集解“君子自纵泰,似骄而不骄。小人拘忌,而实自骄矜。”邢昺疏“此章论君子小人礼,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纵泰,似骄而实不骄。小人实自骄矜,而强自拘忌,不能宽泰也。”

㉒何晏集解“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马曰‘面柔也。’郑曰‘便,辩也,谓佞而辨。’邢昺疏“‘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者,直谓正直,谅谓诚信,多闻谓博学。以此三种之人为友,则有益于己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谓面柔,和颜悦色以诱人者也。便,辨也,谓佞而复辨。以此三种之人为友,则有损于己也。”

㉓请比较邢昺疏“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直遥反,下同。便,旁连反。便便,辩也。宗庙,礼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详问而极言之,但谨而不放尔。”

㉔请比较《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訥訥如也。君在,蹀蹀如也,与与如也。”何晏集解孔安国注“訥訥,中正之貌。”也就是郑重其事,“蹀蹀”,何晏引马融注“恭敬之貌。”与与:何晏引马融注“威仪中适貌。”又皇侃义疏“与与,犹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这些都是“礼”言,体现的是郑重。

参考文献:

- [1] (清) 纪昀总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 [2] 甘霖. 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3] 甘霖. 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4]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5] [德]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6] 俞正燮. 癸巳存稿[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 [7] 向熹. 简明汉语史(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9] 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收稿日期 2022-09-02 责任编辑 罗 敏